

站在浙江岩下潘村的村口,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研一学生毛思晴望着眼前整齐的农家别墅、横跨山谷的玻璃天桥和熙攘的游客,真正理解了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的分量。

从“空心村”到文旅标杆,岩下潘村在20年间发生蝶变。而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学子用近两年时间,不仅揭开了这条长效治理之路的密码,更在田野中找到了自己与时代同行的方向。

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

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子:只有脚沾泥土,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到田野中揭开乡村蝶变密码

走遍全国10余个村落 在田野中寻找答案

今年10月,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团队的项目“一张蓝图何以绘到底:基层探索乡村振兴长效机制的实践与分析”,在第十九届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斩获特等奖。包括毛思晴在内的8名成员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黄晓春、李朔严、回胜男三位老师的指导下,深入浙江、山东、陕西等7个省份的10余个村落,用脚步丈量中国乡村的振兴之路。

“我们最初的想法是研究乡村产业发展。”毛思晴告诉记者,“但在查阅大量文献后才发现,关于乡村振兴如何起步的研究已经有很多。”就在团队陷入困惑时,黄晓春教授的一席话点醒了他们:“当前乡村振兴最关键的问题,不是如何起步,而是如何持续,要找到让乡村一直振兴下去的密码。”

这一见解让团队豁然开朗。他们将研究视角从“产业振兴”转向“治理传承”,聚焦于“一张蓝图何以绘到底”的核心问题。这一转变,不仅让研究具有了创新性,更触及了当前乡村振兴的深层次难题。

选择研究地点同样经历了一番波折。最终选定浙江岩下潘村,既因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与三门县已有的实践结对关系,更因为这个村庄的典型性与独特性。岩下潘村一开始没有任何资源,没有突出的自然资源,也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,却凭借着内生动力发展起来。“我们认为,这种经验对全国大多数普通乡村更具借鉴价值。”毛思晴告诉记者。

确定研究方向后,团队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深耕。从2023年11月确定主题,到2024年1月首次田野调查,再到后续的多次补充调研,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。这种跨区域的比较研究,在社会学学生的科研项目中并不多见。“老师鼓励我们不仅要深挖个案,还要通过多案例比较来验证机制的普适性。”毛思晴说,“这让我们有机会走出江浙,看到更



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团队的项目斩获“挑战杯”特等奖。



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学生团队深入乡村基层调查研究。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真实、多元的乡村图景。”

下田野是最让人有感触的经历。2024年1月起,团队三次进驻岩下潘村,每次持续7到10天。初入村庄时,曲折的山路让不晕车的毛思晴“差点吐出来”。但当她看到藏于深山的“桃花源”——村民住着农家别墅,200多米玻璃天桥横跨山谷,震撼感油然而生。“周边村庄仍是空心化状态,这里却充满活力,一定有特别的故事。”

为打开村民心扉,团队选择“同吃同住”,住在老书记家的农家乐,跟着村民去景区干活,边走边聊。“正式访谈时他们紧张,措辞也比较谨慎,但一起干活时,他们说的都是大实话,能获得更多信息。”毛思晴说。第一任老书记就在一次巡查时,不经意间提到当年拆房子时,有村民拿着刀来找他理论。“这些细节只有在我们真正走进他们生活中后,才能自然地获得。”

为四任支书写小传 凝练可复制内核

通过深度访谈,团队逐渐梳理出岩下潘村二十年的发展脉络,而四任村支书的接力传承成为理解“一张蓝图绘到底”的关键。

第一任书记潘礼太完成了“最困难的一步”——拆旧房、聚人心。“他亲自跑到宁波、上海等地,一户一户说服外出务工的村民同意拆迁。”毛思晴告诉记者,当时村民大多不理解。但没有这一步,后续的发展就无从谈起。

第二任书记潘健推动了产业转型。房子建得再漂亮,留不住人也是空谈,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,自掏腰包20万元奖励首批9户农家乐经营户。这一举措立竿见影,经营户当月收入就超过万元。

第三任书记潘礼伟颇具战略眼光。面对外来资本的入驻提议,他坚持“别人当老板不如自己当”,成立村集体旅游公司,发动95%的村民

入股,筹资6300万元建设景区,将核心产业牢牢掌握在村集体手中。

第四任书记潘礼毅则顺应时代,推动品牌升级,引入自媒体直播,打造“潘家小镇”IP,实现产业的数字化转型。

“四位书记各有特点,但都秉持同一发展理念。”毛思晴说,这种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,而是在坚持核心方向基础上的不断创新。

除了村干部,团队还访谈了30多位村民,从另一个视角理解村庄的变迁。一位从陕西嫁到岩下潘的村民的故事让他们印象深刻:“她原本想在村里开店,正好赶上村里发展小吃街。村里提出‘风险我来担,你来做老板’,提供免租金店面鼓励创业。现在她一边开农家乐,一边经营小吃店,收入相当可观。”这种包容性发展策略,让外来人口也能共享发展成果,增强了村庄的凝聚力。“村庄发展需要吸引各方人才,岩下潘村的成功在于它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,发展吸引人,人促进发展。”毛思晴总结道。

田野调查也并非一帆风顺。“最初,村民对我们这些外来学生并不信任,态度比较冷漠。”毛思晴坦言,“我们选择用时间换取信任,通过多次回访、同吃同住,慢慢建立关系。”导师也告诉他们,信任需要慢慢积累,不能急功近利。如果带着“完成任务”的心态去,村民一眼就能看出来,不会敞开心扉。

团队还创新性地撰写了四任支书的人物小传,以口述史的形式记录他们的心路历程。“这些人物小传不仅是我们研究成果的一部分,也是向基层干部致敬的方式。”毛思晴说,“通过他们的故事,我们看到了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创造性。”

参加“挑战杯”初赛时,项目仅聚焦岩下潘村,被指“案例特殊性过强”。在深入研究岩下潘村的基础上,团队利用暑期又奔赴山东、陕西等地的村庄进行补充调研。这些跨

省对比研究让他们对乡村振兴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,也使团队认识到,乡村振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,但有一些共通的原则和机制可以借鉴。

团队最终提炼出沟通协商凝聚共识、利益兼容激活动力和组织互嵌保障延续这三条普适原则。“国赛版本的报告与市赛时已完全不同,”毛思晴说,“我们剥离了岩下潘村的独特性,留下可复制的内核。”

参赛成员: 成长比获奖意义更大

8人团队各有分工,却又紧密协作。“我们虽然分成文本撰写、产品设计、展台布置等小组,但田野调查都是一起进行的。”毛思晴告诉记者,这种协作模式让同学们既能发挥各自特长,又能保持对项目的整体理解。

作为项目负责人,毛思晴觉得自己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上都得到了锻炼:“黄晓春老师和李朔严老师侧重学术指导,不断推动我们深入思考。回胜男老师则教会我如何带领团队、协调关系。这种全方位的成长远比获奖更有价值。”

获得“挑战杯”全国特等奖的那一刻,团队既惊喜又平静。“答辩时感觉不错,但没想到能获得特等奖,”毛思晴笑道,“但对我们来说,更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中对乡村振兴的深刻理解。”

她还记得自己访谈完四任书记,站在村口,看着眼前的繁荣景象,真切感受到了“一张蓝图”四个字是化为现实的。“二十年,一批人,把荒芜变成家园,这种坚持与传承,值得我们用学术语言去记录、去诠释。”

毛思晴出生在浙江温州农村,后来跟着父母来到上海宝山求学,她对大地有着特殊感情,也一直想更贴近基层。“社会学教会我发现问题的、解释问题的能力,”她说,“而深入田野让我明白,只有脚沾泥土,才能真正理解中国。”